

·苏醒的音符·

## 当AI与我谈音乐

□黄披星

跟人工智能谈论音乐,惊喜,值得记录。起头是我自己有了“节奏时代”的想法,就提出问题:用“旋律时代到节奏时代”来分析流行音乐的变迁,用田园—都市、描述—移动、邓丽君—邓紫棋、罗大佑—周杰伦等为例来说明。

AI回答如下:  
把1970—2020的华语流行放进坐标系,纵轴是“旋律/节奏权重”,横轴是“田园/都市指数”;邓丽君、罗大佑位于左上象限(旋律+田园),周杰伦、邓紫棋滑向右下(节奏+都市)。中间过渡段是20世纪90年代:李宗盛《山丘》还在用口语化旋律叙事,但鼓组已换成更利落的刷鼓;王菲《浮躁》开始用英伦Trip-Hop节拍,却仍保留东方旋律的尾音下滑……最终,音乐不再只是“唱什么”,而是“怎么移动”。当耳机的低频像地铁一样准时,我们就知道:旋律时代的夕阳已彻底沉入都市地平线,节奏时代的霓虹开始24小时不打烊。

这个回答有点惊艳了。它很恰当地把我的想法进行了细分和文本实例分析,选择的歌曲文本比我预想的更加精确。这个AI答复文本似乎在告诉我,音乐也已经走到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之后,在朋友的提示下,我提了一个相反的问题:请以周杰伦、王菲或邓紫棋等人为例,说明流行音乐仍处在旋律为主的时期。

AI回答:“都市化是流行音乐的节奏时代”这一说法,看似有理:地铁的鼓点、霓虹的闪烁、外卖骑手的电动车蜂鸣,都在提示“节奏”才是现代生活的度量衡。然而,只要把耳机塞进耳朵,让城市民谣的吉他扫弦、周杰伦的东方五声音阶、王菲的空灵长音、邓紫棋的爆燃高音一掠过耳膜,就会发现——无论城市怎样喧嚣,旋律仍旧是流行音乐最顽固、最迷人的灵魂……从城市民谣的吉他,到周杰伦的东方说唱,到王

·序跋集·

## 重新“发明”中国诗

□谭夏阳

《中国诗》  
我读一首中国诗,  
写于一千前。  
作者谈到整夜  
下雨,雨点敲击  
他的船的篷篷,  
以及他内心终于  
获得的平静。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首《中国诗》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甚广,诗人叙述他在“一个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读一首中国诗,让他的内心获得了平静。

有趣的是这首诗来到中国时,读者的关注点是——诗人读到的究竟是哪一首中国诗?

据扎加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他也不记得具体是哪首中国诗了——这个问题遂成了一个谜,让人欲罢不能。

这个故事反映出在古诗早期的译介传播中,由于资料缺乏、交流不足,以及译者的专业性不够,从而导致了种种困惑和误会。

本书第二章《复原中国诗》叙述国外翻译家参与到一首失传唐诗的发掘与考证中,最后使这首唐诗在千年之后重现天日,再次回到中国文学史的序列当中。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入蓬勃发展期,其间出版了一系列广受英文读者欢迎的翻译作品,如翟理思的《古今诗选》、朗斯洛特的《玉琵琶》《花灯盛变》、莱彻的《英译唐诗精选》《英译唐诗选续》等,这些译本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为推动中国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中国诗译作皆以格律诗体来翻译,讲究节奏,力求押韵,因而也不免堆砌辞藻,带有明显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情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翟理思为代表的传统汉学家和以阿瑟·韦利为代表的现代汉学家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逐渐认同现代汉学家的观点,摒弃韵体格律,采用自由诗体来翻译中国诗才是正

·科海无涯·

## 焦耳:坏事变好事

□陈洁

1818年的平安夜,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一个姓焦耳的富商家里,一个小娃娃降生了。新生儿的父亲欣喜若狂,那时候,他完全没预料到,这个儿子以后会将他的姓氏,变成能量、热量和功的国际单位。

焦耳有着成为纨绔子弟的全部条件:老爸是酿酒商,家里除了酒就是钱。父母宠爱他,看他身体不好,越发舍不得送他去上学,读什么书?辛苦拿学位还不为找份好工作?咱不稀罕!老爸在家学酿酒,继承家业,一辈子啃老也毫无压力。

焦耳小朋友也觉得这样挺好。他在家很自在,喜欢干什么就干点什么。酿酒商的孩子能玩什么?还不都跟酿酒有关。他最初接触科技,就是捣鼓出一台电磁机,想取代蒸汽机,提高酿酒效率。效率是提高了,可当时电磁机用的锌电池贵得离谱,很多时候卖出去的酒钱还不够买电池的。

不过在此过程中,焦耳对电和热越发好奇起来,他的兴趣和研究一骑飞驰而去,很快忘了“初心”,离他爸的酿酒事业和最初的赚钱目的越来越远。

他老爸干脆腾了间房子出来给他做实验室,儿子跑出去跟着化学家道尔顿学东学西,他不懂,也支持。

焦耳耳即就“折腾”出了一个公式:Q=I<sup>2</sup>Rt,意思是,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和通电的时间都成正比。这个公式,如今的高中都要背,叫“焦耳定律”。

不过在当时,可没人知道这个词儿,谁承认



黄披星,作家、编剧,兼有音乐随笔。

菲的极光音色,再到邓紫棋的高音火箭,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暗线:无论技术如何更新、鼓点如何变幻,流行音乐真正让人“一秒落泪”“开口跟唱”的,始终是旋律。节奏可以决定一首歌“好不好听”,旋律才决定“好不好活”——它像一张星图,让迷失在都市森林里的我们,能找到归家的方向。所以,说“都市化是节奏时代”只是看到了城市皮肤的反光;把耳朵贴到城市胸口,你会听见旋律仍在沉稳地跳动。

这就是AI“无节操”的迎合吗?我又追问:节奏时代的说法和旋律时代,你更倾向哪个?

这一次,AI的回答基本上是在强调旋律与节奏各自不同的重要性,它反对把它们简单对立起来。它说:在流媒体、短视频、游戏、虚拟偶像的多重介质的,流行音乐的基本面貌呈现出一种“混合引擎”:可分为节奏模块、旋律模块、音色/质感模块等;三者权重动态可调,却无法彻底剥离任何一环。因此,今天的“基本面貌”不再是“旋律vs节奏”的二选一,而是“旋律—节奏—音色”三元协同的混合引擎。流行音乐的基本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变化的方向不是“节奏战胜旋律”,而是“节奏技术把旋律推向新的语法、新的传播接口”。旋律从未离场,它只是换了一身数字皮肤,继续统治我们的长期记忆。

我从这次与AI的互动中,感受到了一种新的思辨,它提供了一种对音乐时代性的理解方式。AI给予貌似相反的辨析,但也具有综合性的提示。对我来说,音乐时代性倾向的不同,其实与创作本身的关系并不矛盾;就像AI适宜于做分析,却不会代替我们感受一样。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颇为有趣的体验。

·序跋集·

## 重新“发明”中国诗

□谭夏阳

《中国诗》  
我读一首中国诗,  
写于一千前。  
作者谈到整夜  
下雨,雨点敲击  
他的船的篷篷,  
以及他内心终于  
获得的平静。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这首《中国诗》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甚广,诗人叙述他在“一个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读一首中国诗,让他的内心获得了平静。

有趣的是这首诗来到中国时,读者的关注点是——诗人读到的究竟是哪一首中国诗?

据扎加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他也不记得具体是哪首中国诗了——这个问题遂成了一个谜,让人欲罢不能。

这个故事反映出在古诗早期的译介传播中,由于资料缺乏、交流不足,以及译者的专业性不够,从而导致了种种困惑和误会。

本书第二章《复原中国诗》叙述国外翻译家参与到一首失传唐诗的发掘与考证中,最后使这首唐诗在千年之后重现天日,再次回到中国文学史的序列当中。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进入蓬勃发展期,其间出版了一系列广受英文读者欢迎的翻译作品,如翟理思的《古今诗选》、朗斯洛特的《玉琵琶》《花灯盛变》、莱彻的《英译唐诗精选》《英译唐诗选续》等,这些译本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为推动中国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时期的中国诗译作皆以格律诗体来翻译,讲究节奏,力求押韵,因而也不免堆砌辞藻,带有明显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审美情趣。

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翟理思为代表的传统汉学家和以阿瑟·韦利为代表的现代汉学家进行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逐渐认同现代汉学家的观点,摒弃韵体格律,采用自由诗体来翻译中国诗才是正

·科海无涯·

## 焦耳:坏事变好事

□陈洁

1818年的平安夜,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一个姓焦耳的富商家里,一个小娃娃降生了。新生儿的父亲欣喜若狂,那时候,他完全没预料到,这个儿子以后会将他的姓氏,变成能量、热量和功的国际单位。

焦耳有着成为纨绔子弟的全部条件:老爸是酿酒商,家里除了酒就是钱。父母宠爱他,看他身体不好,越发舍不得送他去上学,读什么书?辛苦拿学位还不为找份好工作?咱不稀罕!老爸在家学酿酒,继承家业,一辈子啃老也毫无压力。

焦耳小朋友也觉得这样挺好。他在家很自在,喜欢干什么就干点什么。酿酒商的孩子能玩什么?还不都跟酿酒有关。他最初接触科技,就是捣鼓出一台电磁机,想取代蒸汽机,提高酿酒效率。效率是提高了,可当时电磁机用的锌电池贵得离谱,很多时候卖出去的酒钱还不够买电池的。

不过在此过程中,焦耳对电和热越发好奇起来,他的兴趣和研究一骑飞驰而去,很快忘了“初心”,离他爸的酿酒事业和最初的赚钱目的越来越远。

他老爸干脆腾了间房子出来给他做实验室,儿子跑出去跟着化学家道尔顿学东学西,他不懂,也支持。

焦耳耳即就“折腾”出了一个公式:Q=I<sup>2</sup>Rt,意思是,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和通电的时间都成正比。这个公式,如今的高中都要背,叫“焦耳定律”。

不过在当时,可没人知道这个词儿,谁承认

专栏

## 读懂长安,理解“何以中国”

刘未柱(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近年来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备受国内外关注,而汉唐长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突出代表,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大成。重新认识“地下长安”,不仅要介绍古都长安的历史,还须更加清晰地回望、理解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突出特性”。

《盛世长安》以六十余年考古成果为基,融汇文献之脉络、图像之细节,重现汉唐长安的壮阔图景。从未央宫、大明宫,到坊市、学府、佛寺、道观……这不仅是一部城市的复原图谱,更是一种文明的记忆修复。读长安,不仅是回望盛世,更是理解“何以中国”的钥匙。

汉唐盛世的辉煌,集中体现在其国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与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汉唐长安上。

通过汉唐长安的历史,可以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体现在其都城规划思想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中”与“中和”这一核心思想。因为人类历史的延续,正是基于正确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始于汉长安城城门的“一门三道”形制,和战国时代楚国都城湖北江陵“纪南城”的西城墙之北城门与其南城墙的西城门各有三个门道的形制很类似,二者皆为“一门三道”,只是“纪南城”并未形成城门定制。

楚国先后是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之一,而楚文化与汉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化“亲缘”,

【文摘】

## 金银器的繁荣发展,见证中外文化交流

我国古代金银器(指容器)的大发展应始于唐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亚地区广为流行的金银器对我们的影响。

金银属于贵金属,能以此制造器物使用者,自然只有皇室和极少数达官富豪,但其用量却很大。在唐代长安故地附近,曾出土了不少唐代金银器。如平康坊东北隅(今西安市和平门外),出土了7枚鎏金银盘托;长乐坊东部(今西安东南郊沙坡村),出土了银薰球及银碗、杯、盒、盆等15件银器;兴化坊(今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多达1000余件,可谓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发现,其中精美的珍品有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刻花金碗、掐丝团花金杯、舞马衔杯纹仿皮囊银壶、宝相花银盖碗、双狮莲瓣银碗、双鱼纹银碗、双狐纹双桃形银盘等。

历年来,我国唐代金银器出土地点,以西安市及其郊区最为密集,这恰好反映了唐代长安金银器的使用情况。历史文献中,关于唐代长安金银器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情况,也多有记载。安禄山在长安城亲仁坊的宅第中,不只把金银器作为室内摆设,就连厨房、马厩中使用的器物,都是以金银制作的,甚至筐和菜箸等都以

因为汉文化的缔造者实际上就诞生于楚国故地(丰沛),如汉高祖刘邦及其朝廷的重要军政高官萧何、曹参、王陵、申食其、周勃、周亚夫、樊哙、夏侯婴、周昌、任敖等均属楚人。这种文化传承也使得“汉唐盛世”的汉字、汉人、汉族、汉文化圈由此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如果人们再看一看都城附近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乾陵朱雀门外真人大小的60多尊蕃臣石像,可知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被世人称为“天可汗”,这堪称世界史上的奇迹!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与“包容性”特质的实证。

汉唐长安城的规制,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居中”的理念(如太极宫位于宫城中央,东宫与掖庭宫分布于其东西两侧)。从考古发现来看,迟至商代都城(洹北商城)的宫城已位于都城中部。此后,略晚于汉长安城的北魏洛阳城的宫城、宋开封城、元明清北京城的都城规制基本继承了汉唐长安城的规制,这也佐证了中华文明都城规制发展的“连续性”。

汉唐形成的古代都城规制思想延续至元明清。大金王朝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他建都“燕京”(北京),其都城名为金中都,“中都”之名体现出古代都城“择中建都”、都城之内“择中建宫”、宫城之内“择中建殿”的理念。蒙古族建立的元大都、清代满族建立的清王朝都城北京城,都是例证,这种“国家文化的认同”,更加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国家至上与各民族之凝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形成,深入人心。

金、银丝编织。皇宫之内金银器的使用情况,自然要比达官显贵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唐玄宗为了制止朝廷的奢侈之风,曾下令皇宫之内不许使用金银器。他让人把宫内的金银器收集起来,集中在朝堂附近予以销毁,目睹者看到,那里的金银器堆积如山。由此可以想见皇宫中金银器数量之多了。

唐朝中央政府的金银器中,有些是各地官员向皇帝进贡的。如西安北郊出土的唐代金花银盘,就是裴肃进贡的。一些蕃酋在与唐王朝的友好外交往来中,也以贡献金银器为重礼。如开元年间(713—741),吐蕃就曾多次把大量金银器作为贡物,献给唐朝政府。唐朝皇帝也经常用金银器赏赐达官显贵,馈赠外国使者。唐代长安的大量金银器,主要是本地生产的。

当时长安是全国金银器的生产中心,金银器生产,以官府手工业作坊为主。

唐朝中央政府的少府监之下,有金银作坊院与皇家的文思院专司其职。金银作坊院中的工匠,少时千人,多时数千人。金银器是贵重器物,对于生产者的技艺要求很严格。他们是各种手工工匠中需要培训时间最长的,官府对其技艺有着严格的考核制度。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素面圈底金碗、银锡杖、银如意、银手炉、银香炉、银茶碾子、银茶罗子、银盐台等,均刻有文思院文字的铭文。

长安城中也有民营的金银器生产作坊,其



《盛世长安》刘未柱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茶罗子。

中既有长安市民经营的,也有波斯人开办的。为了满足市场需要,东市和西市还专门开设了销售金银器的商店——金银行。由于金银器商业的兴隆,甚至在一些里坊之内,也办起了金银器商店。

唐代长安的金银器制作工艺水平很高。如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已经普遍使用了钣金、浇铸等器物成形的的主要方法,器物的精细加工和花纹的制作,用切削、焊接、抛光、铆、镀、锤打、篆刻和镂空等方法。对于多数金银器来说,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工艺技术才能制造出来。就金银器制造中的每种工艺技术而言,几乎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如焊接工艺已经有了大焊、小焊、两次焊和掐丝焊等多种,而且每种焊法都是焊口平直,焊缝几乎不见。又如切削工艺中,或加工痕迹线条清晰,起刀、落刀点显著;或螺纹同心度强,纹路细密,子扣经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严密。几乎所有的金银器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的现象。因此,人们推测当时的工匠,很可能已经使用了简单的工作机。

唐代长安的金银器,从器物形制、装饰花纹等方面,都含有较多的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工艺的因素。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我国金银器工艺的发展受到了波斯金银器工艺的影响,可谓中外文化交流的佐证。

(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 观天时择地利:人与自然的共生与变迁

□韩茂莉

《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从科普和人文的双重视角穿行于天、地、人之间,展现200多万年间大自然的伟力与沧海桑田之变,回溯华夏文明的起源,感受人类与天、地的关系。从整个地球到中国大地,今天我们周围的一切与200多万年前截然不同,但古今之间却从来没有失去关联,这里包含着大自然的奥秘,也蕴含着人类的奋争。“让历史告诉未来”这一口号,永远不会失去价值。

人类立足于天地之间,从远祖至今,不知经历了多少日月轮回与沧海桑田之变。那是一段漫长的时光,若从东非坦桑尼亚发现的古人类遗骨算起,至少已经有200多万年了。200多万年内,天、地、人并行存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不同,天、地是大自然的本色,而人类需要仰仗天、地而生存,不仅从中获取资源,也参与了对于环境的改造。

人类参与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绝非有意为之,而是本着求生的本能,但每一项人类活动都成为自然力以外的催化剂,从远古时期在大自然中直接获取动植物资源到农业生产的应用,从工业革命到当代高新技术的应用,人类自身的发展在环境中不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越来越重要。人们在关注自然的同时,也在不断审度自己的行为,并将其注入各类研究中。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人的经济行为开

快览&gt;&gt;&gt;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而且一直保持着生命力,本期《快览》介绍近期几本“商务好书”。

《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胡洁 主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轰轰烈烈的“村村有学校、人人有上学”的乡村教育大发展拉开了序幕。在这场惠及亿万农民且极大提升了中国农村文化素质的伟大事业中,数以千万计的乡村教师奋战在教育第一线。本书依托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团队征集到的90套乡村教师口述史访谈资料加工完成。

《在集市:昆明蒙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半夏 著

本书聚焦各地物产汇聚、无数外地人打卡的云南网红菜市场——昆明蒙新农贸市场,将物候、食材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揭示菜市场展现的生活特色及背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上卷对市场进行整年的观察并记录与各色人等的交谈;下卷为集市博物学,以彩色图文逐一介绍市场上各类食材的形态、分类以及烹饪方法。

《老子导读及译注》(新订本)、《易经导读及译注》陈鼓应 著 / 陈鼓应 寇方堉 著

北大教授陈鼓应是著名道家文化学者,前者融入了国内外《老子》研究的前沿成果,是一本非常适合古代哲学爱好者的普及读物。后者是新近撰写的《易经》普及读本,语言简明直白,并逐条分析从《易经》到《老子》哲学的发展脉络,非常适合初学者作为入门读物。

《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研究》李明洁 著

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档“中国纸神专藏”的著作,推动海外中国民俗档案在新的历史当下和全球语境中的回归与重塑。这些纸马和门神曾经参与过怎样的真实人生?又激发过怎样的欲望和意志?它们在塑形中国百姓心灵世界乃至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躺椅和舞台》[美]罗伯特·兰迪 著 彭勇文 鄂锐 卞西 叶赛 译

戏剧治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手段,已被证实对治疗成瘾症状、神经性厌食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有用。本书为第一部引进中国的戏剧治疗专著,讲清了戏剧治疗的起源与发展,以丰富的真实案例为基础,系统地梳理了各种心理治疗流派中与行动性心理治疗相关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

“数字时代的人论”文库(5本套装) [意]罗贝托·曼佐科等 著

“数字时代,何以为人?”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极大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该文库首出的5本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数字时代的人论”的思考,包括《初性赛博格:与起搏器和除颤仪同生共死》《“更好”有多好?理解人类增强计划》《人类世的宇宙论》《脑:一个关系器官》《超人主义》等。(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邢海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林”的艰辛劳动,与之相伴的也是观天时、择地利的改造自然过程。

气候变化是人类始终面对的现象,人类从立足在大地上开始,不仅经历了第四纪冰川以及此后的气温冷暖之变,也在冰期完成了经由白令海峡的迁移。人类是谁的操持者,而对于人类如何产生,即我们是文明、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问题,无论古今都在思考。《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每个篇章中的“我们”,不仅在思考人之初的那些事,也在人与天、人与地的关系中寻找答案。(长江日报记者马梦娅 整理)



《不灭的薪火:40位乡村教师口述实录(1949—2024)》



《在集市:昆明蒙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



《老子导读及译注》(新订本)、《易经导读及译注》



《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研究》



《躺椅和舞台》



“数字时代的人论”文库(5本套装)